



■本报记者 路斐斐

王朝柱：为中国革命写一部“大书”

以手中笔写时代与历史的真实

记者：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您几乎同时期创作出版了《李大钊》《龙云与蒋介石》等几部很有影响力的史传文学。然而在此之前，您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培养的大学本科生，就读的却是当时颇为“洋气”的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专业作曲，期间不仅发表过原创歌曲，后来还曾作为唯一一名青年人被选入了198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而特别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的九人创作小组（其中包括石祥、乔羽、魏风、时乐濛等音乐大家）。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转向文学及影视剧创作的？

王朝柱：上世纪50年代，15岁的我凭一支笛子和粗通的乐理，考入了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后又顺利升入音乐学院本科，跟随当时的赵沨院长等学习西方交响乐。作为一名酷爱民族音乐的农村学生，我是当时音乐学院里惟一讨过饭的穷学生，身上有不少土气，在音乐学院显得颇为“另类”，但却并未因此受到另眼相待，反而因为特殊的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受到了师友们的很多关照，虽然后来因为历史的种种因缘我最终在毕业之后放弃了我所喜爱的音乐创作事业，但在音乐学院的学习和生活对我一生的影响还是很大的，除了收获了珍贵的友谊，积累、开拓了很多方面的阅读、学习外，我对音乐的理解和热爱，以及音乐作为一种最为重视内在结构的艺术形式，对我后来毕生从事的文学及影视剧的“史诗性”“音乐性”创作而言，都有很多独特的启发。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使我们在音乐学院的学习、生活也受到了影响，学院的很多师生员工因此被下放到保定、张家口、天津等地的农村参加“劳动改造”，我也未能例外，但那时年轻，又兴趣广泛，一方面也参与着社会运动，一方面也暗自相信，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批判的人们一定会被平反，也始终莫名相信一切终会过去。于是，白天我们同大家一起参加劳动改造，中午我却不想休息，就坐在湖边柳树下读书也写些东西，做了大量的积累。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到上世纪80年代，我已开始在很多地方尝试发表作品了，直到改革开放的到来，随着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涌入，面对我们民族曾经遭遇的一些磨难，社会上开始出现了一些尖锐的声音，突然而至的纷繁现状，使我也陷入了极大的茫然和愤慨，不光是在我后来被调入的《中国革命之歌》创作小组，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听到一些激烈的争论，我更加感到，我所钟爱的音乐已难以表达内心的复杂了，于是便暗自决定“弃乐从文”，想以我手中的笔把我自己眼中所看到心中所感受到的时代与历史的真实以及我自己的看法统统都写出来。

记者：1989年您出版了72万字的小说《李大钊》。自此，以大部头写史论道几乎成了后来您的许多史传文学的“标配”。您曾说过，即使同样的史料在不同人的眼中也会得出不同的看法，那么您研究历史、书写历史人物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又是什么？

王朝柱：1989年李大钊同志诞辰100周年前夕，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我历时8年写就的长篇传记文学《李大钊》，并由出版社和《光明日报》联合举办，在人民大会堂为这部书的出版特意举行了座谈会，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胡乔木同志出席了这次座谈会并高度评价了这本书。那天参加会议的还有李大钊之子李葆华、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以及潘峰、张明远、刘白羽、李瑛等老同志。关于这本书的出版前后，我的责编也是我后来一生的好朋友李硕儒同志后来还专门撰文进行了回顾，并特别记叙了他第一次见到我这个名不见经传、头顶半旧的鸭舌帽、身上裹着绿色旧军大衣的作者之情形。当时他收到的书稿还有我同时投送的《谍海奸雄——土肥原贤二秘录》，那本书的文献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也得到了他的肯定，这是后话。在当时仅以手稿质量而论便下定决心出版也足可见编辑对这本书的认可与重视，也证明了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在当时社会上风行着各种解构传统、解构思想的风潮下，我写李大钊更重要的是想用这个名字去写一个时代。李大钊是河北人，而我也还是河北人，是晋察冀的孩子。是历史让我写李大钊，我是在写李大钊，我也是在写那不能被历史淹没的20万晋察冀英雄人民。

可以说，在我一生最痛苦、最难过的这段时间，我的创作却出现了第一个丰收期：我参加创作的话剧《决战淮海》上演了，我写的电影《龙云和蒋介石》公映了，与朋友合作的电视剧《巨人的握手》等播出了，除了《李大钊》，我的长篇小说《爱的旋律》

《女囚徒》等也相继出版了。我还记得大评论家冯牧同志对此这样评价过：“王朝柱一脚就把作家的大门踢开了！”

写一部中国革命的“大书”

记者：1996年，您任编剧之一的电影《长征》上映，5年后同名电视剧作为您在同时期影视剧创作的代表作之一，一经播出便因艺术特色鲜明、主题深刻宏大引起了社会很大反响，被评论界誉为当时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高峰之作”。作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和艺术创作的重大题材，从1951年李伯钊的歌剧《长征》算起，几十年来长征在舞台、银幕、荧屏上已有过各种不同形式、不同视角的展现，您的创作在当时是如何打开视野的？

王朝柱：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听着长征中的一个个传奇故事长大的，对长征精神我从小就怀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崇敬之情。关于长征，1998年我曾出版过近70万字的长篇小说《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还写过一个留有很多遗憾的电影文学剧本《毛泽东在长征中》，后来被拍成电影《长征》（1996年），电视剧《长征》当时的创作背景是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在中央文献研究室、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等单位有关专家多次论证和推动下，决定由我出任编剧，由中央电视台投拍这部电视剧。

《长征》这部剧的创作中融入了我对影视剧史诗品格的很多思考。首先在剧作结构上，我心中的《长征》是独特的。后来在《长征》文学剧本的前言中我曾写过这样一句话：“我希望大型电视连续剧《长征》能向着大气磅礴、荡气回肠的美学品格前进。”近半个世纪以来，国产影视剧虽然对长征的每个局部事件几乎都做过取材，但却还没有一部全方位反映长征的史诗问世。接到任务后，我重新审视了中央红军的这367天，将我对音乐的理解融入了整部剧的创作中，将整个长征过程看作是红军用生命写成的4个乐章的交响曲：从1934年4月广昌保卫战打响到之后的湘江血战，从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回指挥岗位领导红军取得一系列胜利，再到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后又陷入的危机，直到腊子口战役的胜利结束。在这部交响曲里，我既写了红军的惨败与牺牲的惨烈，也写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悲壮，同时以极大的勇气写了党内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李德、博古、周恩来等同志应负的历史责任；不仅写了毛泽东四渡赤水的用兵如神，也写了他指挥土城战役的失误等。所以后来《长征》能获得很大成功，使观众产生强烈共鸣，我认为与当时的创作环境下，整个剧作呈现出来的史诗气质以及对重大历史事件、领袖形象的真实展现和具有突破性的塑造是有很大关系的。

特别是在人物塑造上，电视剧《长征》中出场的敌我双方有名有姓的政治家、军事家多达百人，我以长征作为中国近代政治家表演的舞台，再现了各种各具特点的人物形象，其中最重要也最不易有所突破的还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剧中我通过两次激烈的党内斗争，重塑了一个由楚文化孕育而成的、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毛泽东形象，既写出了毛泽东敢于向强权做斗争的一面，也写出了他面对恃强自傲的张国焘大义凛然的另一面，使一个新的毛泽东形象出现在了屏幕上；在对周恩来艺术形象塑造上，我也抓住了人物特有的心理——在清醒中的痛苦——来推演剧情，深化人物性格，因此这一个新的领袖形象在当时得到了很多观众的接纳和认同。

记者：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10年间，您以花甲之龄在影视剧创作领域特别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方面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速度和密度，以电视剧《长征》

为节点，往前有《周恩来在上海》（1998）、《开国领袖毛泽东》（1999），往后从《延安颂》（2003）、《船政风云》（2007）、《解放大西南》（2010）等，您的剧作在历史的经度和纬度上，为观众带来了一个丰满而多元的时空呈现，因此也有评论家称您为学者型作家编剧。您是如何保持如此繁盛的创作的？

王朝柱：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至少10年多的时间里，我在影视剧创作方面确实保持了一个相对均匀高产的速度。2005年播出的电视剧《八路军》就写于近年来我创作状态几乎最好的时期，以当时的身体条件可以达到两天写一集的创作速度。我写作的方式可能跟很多人不同，“读”和“想”的时间往往要超过动笔的时间，一旦想好，大多提笔一气呵成。所以，可以说当我开始进入从鸦片战争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题材的创作时，我对中国的这段历史已做好了充分的史料阅读与研究积累了。包括这其中涉及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党史，共产国际史，国共关系、中日关系等相关历史，我都做了相对比较系统的研究准备了。这也因为我从很久以前就已下定决心，要以电视剧的形式为中国革命写一部上自辛亥革命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500集的“大书”，并选定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作为这部大书的主人公。作为这部大书的一部分，2007年播出的由我编剧，以洋务运动、船政兴衰为主要内容的重大题材电视剧《船政风云》，从题材所涉时间来看，实际上才应是这部大书的开篇，而目前我手上这部尚未及投拍的，将反映中国共产党建党历程的电视剧则更接近于大书的结尾。在这部大书里，我已写下了很多人，不管是张学良、冼星海，还是李大钊、孙中山，我认为他们的命运，都是中华民族命运的缩影，他们的奋斗之路，都在从不同的层面、角度折射着中国人民自强不息、走向光明的不懈追求，不惧牺牲的伟大历程与永远值得被铭记、礼赞的民族精神与英雄魂魄。

电视剧《长征》之后，我有幸又开始了对表现我们党在陕北窑洞指挥抗战过程，并逐步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的电视剧《延安颂》的创作。在这部剧以及之后若干剧目的创作中，我在进一步以艺术创作的形式理清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在进一步挖掘并重现包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内的延安精神等中国革命历程中留下的无数宝贵精神财富时，我也继续遵循着并坚定地实践着用唯物史观解读中国革命历史、以史诗品格艺术再现历史的创作理念。

尊重历史、礼赞英雄，是我的使命与责任

记者：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以您的文学剧本《辛亥革命》摄制的电视剧《辛亥革命》，被评论家认为是对20世纪以来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的全过程、全方位、全景式深刻而又生动形象的艺术展示。两年后的2013年，由您编剧的另一部电视剧《寻路》也在央视播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两部作品的主题都在于寻路，今天来看，您是如何思考这两部作品的创作的？

王朝柱：对于一切有历史责任感的严肃作家、剧作家来说，“为什么而写、如何才能写好这部作品”是每次在构思创作一部新的文学、戏剧或影视作品时一定会发出的自问，我时常要经历这样长期而又痛苦的深思熟虑，才会动笔。特别是对于这样两个题材的创作而言。《寻路》顾名思义就是探寻中国革命之路。自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探寻中国革命之路前仆后继，用生命和鲜血铺成了一条红色之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继承了中华民族这一光荣的革命传统。

《寻路》选择截取的历史长度只有5年，但这5年中，幼年时期中国共产党怀着一腔救国救民的热情，在盲目地期望苏联模式救中国的错误革命道路上，先后经历了1927年的“四·一二”大屠杀，直到1932年宁都会议毛泽东被剥夺军权；但同样也是在短短5年间，尽管依然阻力重重，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还是历经千难万险、九死一生，探寻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历史给后人留下了太多启示与一笔了不起的精神财富。所以《寻路》这段历史是极其复杂的，在创作上的挑战也是很大的。在这一点上2011年播出的《辛亥革命》也相类似，在这部剧的创作中，我坚持了两个基本原则：一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社会上曾流传的否定革命的“告别革命论”，同时礼赞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先行者的崇高品格。二也要写出参加辛亥革命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两面性，还历史以真实，还人物以公道。

《辛亥革命》也好《寻路》也好，它们都深刻揭示了一个道理，就是道路决定命运。道路的正确与否，决定着中国革命的胜败。而正确的道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通过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和思想路线找到的，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是多么不容易，所以我们更该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同时，我在《寻路》里也浓墨重彩地张扬了一种革命正气，我希望今天的人们能以史为鉴，警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每一位中国人的心中牢牢地竖立起理想和信仰的大旗。

记者：去年，您创作了讲述1949至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的这段历史风云的电视剧《换了人间》。以近80岁的高龄还能以旺盛的精力和脑力深耕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这在中国的编剧界、作家群里已不多见，多年来您收获了很多国家级、国际级的最佳编剧奖，还有若干终身成就奖，未来您还有哪些心愿想去实现？

王朝柱：42集电视文学剧本《换了人间》完稿后，我曾像往常一样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这部剧原来的名字叫《转折》，创作早先是受了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振武同志所托，后来得了一场大病，这部剧的写作就中断了，再次重启项目时，做了多方论证，认为原先的创作面有些窄，难以写出当时我国内政外交等方面的全面转折，所以后来就重新调整创作，剧名也随之改为了《换了人间》。《换了人间》讲的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之后发生的事情，这部戏的戏魂就是要艺术且形象地反映这一伟大的时代变革，让今天的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明白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中国人民为什么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就是想以宏大的历史视野，还有诗人的激情来描述这一伟大的历史。我目前正在等待手头这部讲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电视剧本的顺利投拍，等到2021年这部剧播出，我心中的这500集大书、2000多万字就算是写完了。但我并不会停下来，我还会继续创作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我常讲我的创作观说来简单就两点，一是尊重历史，二是礼赞英雄。这两点是永远不会变的，是我身在这个时代，身为一个剧作家、一名作家的使命与责任。

